

修订版

中国哲学 通史简编

冯契 / 著
陈卫平 / 缩编



哲学的根本意义在求交通，要求把握天道，综合人的本质力量，贯通天人。

“穷”就是穷究。探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自由因是什么，宇宙的演变、人类的进化要达到何等最高境界，也就是终极关怀是什么的问题。“通”就是会通，融会贯通。把握贯穿于自然、人生之中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并要求会通天人、物我，达到与天地合其德，获得真正的自由。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修订版

中国哲学
通史简编

冯契 / 著

陈卫平 / 缩编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哲学通史简编 / 冯契著; 陈卫平缩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108-04413-6

I. ① 中… II. ① 冯… ② 陈… III. ① 哲学史—中国—缩编
IV. ①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0922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储平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8.7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出版说明

在历史上任何的转型时代，总会有一部分读者产生读哲学的需要。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哲学经典，来获得思考的工具，寻求社会与人生问题的答案，并汲取心灵的慰藉。经典作品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冯契先生（1915—1995）的名著《中国哲学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哲学史》，是这位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多年研习中西哲学的总结，也是今天的读者仍然需要阅读的少数经典作品之一。

这两部名著，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由国内的两家出版社分别刊行。当时印量甚少，如今已很难寻得。我们此次重刊这两部书稿，一方面，是鉴于读者对这两部著作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不失为对这位哲学家、思想家的一种纪念。

我们特别邀请冯契先生的学生和助手陈卫平教授，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前提下，重新校订了书稿，并进行了文字及格式上的整理。谨此致谢！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1 年版作者前言

本书是我的两种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缩编本。缩编工作由陈卫平同志担任，他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最后我通读了全部书稿，作了一些修改，把它定名为《中国哲学通史简编》。

之所以要出版这个《简编》，是出于两点考虑：“古代”和“近代”两种著作共约 100 万字，对一般读者来说，分量未免太多了，此其一；国内外有些学者向我建议，搞一个缩本，便于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此其二。

定稿之后，我觉得这个《简编》虽是个缩本，却也有它自己的个性。它把“古代”和“近代”两种著作合在一起，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自上古至 1949 年为止的“中国哲学通史”；又由于它是简化的，贯穿其中的通史的线索便显得更加清晰，使读者容易把握。陈卫平同志的缩编工作是忠实于原著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劳动。他多年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有许多心得、体会，很自然地灌注到这个缩本中，增添了它的个性特点。

本书的英译正由徐汝庄、童世骏两位同志协作进行中。他们从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使得本书的质量有所提高。

冯 契

1989 年 11 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1
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5
第三节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11
第一篇 先 秦	
第一章 儒、墨、道、法诸子的兴起	21
第一节 孔子的仁知统一学说	21
第二节 墨子及儒墨之争	
——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对立	25
第三节 《老子》：“反者道之动”	
——辩证法否定原理的提出	31
第四节 《孙子兵法》以及法家之初起	36
第二章 百家争鸣的高潮	39
第一节 《管子》：法家和黄老之学的合流	39
第二节 儒法之争与孟子性善说	42
第三节 庄子：“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	50
第四节 名家“坚白”、“同异”之辩	
——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对立	58
第五节 后期墨家的名实观和自然观	62

第三章 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	71
第一节 荀子对“天人”、“名实”之辩的总结 ——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71
第二节 韩非：“不相容之事不两立”	88
第三节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 ——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的确立	95
第四节 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 ——辩证逻辑的比较法运用于具体科学	101
第一篇小结	106
第二篇 秦汉至清代（鸦片战争前）	
第四章 独尊儒术与对儒家神学的批判	115
第一节 董仲舒和《淮南子》 ——目的论“或使”说与机械论“或使”说的 对立	116
第二节 王充：唯物主义的“莫为”说反对“或使”说	124
第五章 玄学与儒、道、释的鼎立	133
第一节 王弼的“贵无”说和裴頠的《崇有论》	134
第二节 嵇康对宿命论的挑战	140
第三节 《庄子注》：“有而无之” ——“独化”说反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	142
第四节 葛洪的道教哲学和僧肇的玄学化佛学	149
第五节 范缜对“形神”之辩的总结 ——唯物主义质用统一原理的运用	154
第六章 儒、道、释合流的趋势	159
第一节 天台宗：“三谛圆融”和“无情有性”	161
第二节 法相宗论“一切唯识”与华严宗论“法界缘起” ——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	164

目 录

第三节	禅宗：佛学儒学化的完成·····	169
第四节	李筌的唯意志论倾向的道教理论·····	175
第五节	柳宗元、刘禹锡：“天人不相预”与“天人交相胜” ——对“力命”之争的唯物主义的总结·····	177
第七章	理学盛行和对理学的批判·····	186
第一节	周敦颐、邵雍和二程：正统派理学的奠基者·····	188
第二节	张载对“有无（动静）”之辩的总结 ——以气一元论阐发对立统一原理·····	191
第三节	朱熹的理一元论体系·····	198
第四节	与程朱理学对立的“荆公新学”和“事功之学”·····	206
第五节	王守仁的心一元论体系·····	211
第六节	李贽的异端思想·····	219
第八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阶段·····	223
第一节	王夫之对“理气（道器）”、“心物（知行）”之辩的总结 ——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统一的 气一元论体系·····	224
第二节	黄宗羲的启蒙思想与历史主义的方法·····	242
第三节	顾炎武的“修己治人之实学”·····	247
第四节	颜元论“习行”和戴震论“知”·····	252
第二篇小结 ·····		258
第三篇	近代（1840—1949年）	
第九章	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	273
第一节	龚自珍：“众人之宰，自名曰我” ——近代人文主义的开端·····	273
第二节	魏源：“我有乘于物”和“及之而后知” ——“心物（知行）”之辩在近代的开端·····	279
第十章	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	285

第一节	康有为：历史进化论的提出	285
第二节	谭嗣同：“冲决网罗”之仁学	292
第三节	严复的“天演之学”与经验论	296
第四节	梁启超论“我”之自由和“群”之进化	305
第五节	章太炎：“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 ——社会实践观点的萌芽	314
第六节	王国维：哲学学说的“可爱”与“可信”	321
第七节	孙中山的进化理论与知行学说	326
第十一章	哲学革命进入唯物辩证法阶段	334
第一节	李大钊、陈独秀：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335
第二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和梁漱溟的直觉主义	344
第三节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及瞿秋白的历史决定论	354
第四节	鲁迅论国民性及其美学思想	360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 贡献	368
第一节	李达、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	369
第二节	熊十力：“新唯识论”	374
第三节	朱光潜：美学上的表现说	379
第四节	金岳霖：“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 ——在实在论基础上的感性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	385
第五节	冯友兰：“新理学”	394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研究	400
第七节	毛泽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历史观与认识论中的“心物”之辩的总结	404
第三篇小结	422
引证书目举要	448
再版后记	451

绪 论

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要科学地研究中国哲学史，总结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首先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本书在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作了下面的探讨。

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哲学作为以理论思维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其发展的根据是什么？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普遍和特殊互相联结的观点来考察。

从理论思维的共同根据来看，哲学同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根源于社会实践并受其制约，不过，社会实践的这种制约作用往往是通过某些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就哲学而言，这种中间环节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一定时代经济关系的政治思想（以及伦理思想）的斗争；一是体现一定时代社会生产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这两个方面就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这两条腿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统一于社会实践。我们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来把握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中国各个社会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思想斗争都给予哲学发展以

巨大的影响，但也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一般地说，在先秦和近代这两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政治思想斗争对哲学的推动比较显著。先秦时期反映地主阶级变法改革的“古今”、“礼法”之争和近代反映人民大众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古今”、“中西”之争，都深刻地、明显地制约着这两个时期的哲学的发展，同时这两个时期的哲学革命又为政治变革作了先导。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两个时期的科学发展与哲学的关系。例如，墨家、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形态与古代自然科学是密切联系的，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是以西方传来的近代科学为基础的。

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哲学发展的情况，与先秦和近代这样的变革时期有所不同。这是封建社会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哲学斗争主要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思想斗争（如义利、理欲之辩）是这个时期哲学发展的一方面根据，然而，推动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的，主要的、首先的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带来的自然科学的进步。这个时期哲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例如，从王充到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都以气一元论形态出现，就与当时的农学、天文、历法、音律、医学等科学都以气分阴阳、阴阳相互作用的理论作为基本观点是有关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有比较突出成就的哲学家，如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等，都与科学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再从哲学的特殊矛盾来看，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之处，在于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各个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这是需要在哲学史研究中认真考察的。例如，哲学基本问题在先秦表现为“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在两汉表现为“或使”、“莫为”之争和“形神”之辩；经过曲折的发展，到宋明又表现为“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客观上包括三项，即物质世界、主观精神和概念（范畴、规律）。这三项在中国哲学学术语里则分别是“气”、“心”、“理”或“道”。上述的哲学基本问题

表现于中国哲学各阶段的争论，归结起来，就是争论物、心、理三者的关系。因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最后，就形成了三种形态：气一元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论）、心一元论（主张主观精神第一性的主观唯心论）、理一元论（主张概念第一性的客观唯心论）。

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来看，其中包括感性与理性、绝对与相对、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这些认识过程的必要环节。这些环节也构成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哲学争论的重要问题。同时，哲学家在进行哲学争论时，都把逻辑范畴作为工具，以一定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学说并驳斥别人。这样，围绕着逻辑方法和逻辑范畴又引起了新的争论。比如，先秦时期的“坚白”、“同异”之辩，以及贯彻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于“类”、“故”、“理”的逻辑范畴的探讨。这就说明，哲学的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且还和其他从属的问题相联系。

综上所述，哲学一方面具有同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共同的根据——社会实践，另一方面还有其特殊的根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我们把上述两方面的考察结合起来，就能把握哲学的历史发展。

所以，哲学史的定义可以表述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

二、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

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因素。这一合理因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吸取。这就要求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把现实的历史看作逻辑思维的出发点和基础；另一方面必须善于剥掉哲学体系的外在形式，摆脱历史偶然性的干扰，以便在历史现象中认出逻辑发展的环节来。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要把握所考察对象的基本的历史线索，看它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根据是什么；又是怎样发展的，经历了哪些阶段。要真正把握基本的历史联系，就须清除掉外在形式和偶然的東西，以

便对对象的本质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对每一发展阶段或环节都能从其典型形式上进行考察，而后综合起来，把握其逻辑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逻辑的方法。所以，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是统一的。

哲学史表现为互相对立的哲学体系更迭的历史，历史上每个重要的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对自己的宗旨进行阐明和论证而形成的概念结构。哲学史研究要完整地、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各个哲学体系，而又必须粉碎这些体系，把其中所包含的作为人类认识史的必要环节揭露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历史上每一个哲学体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进行考察，从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认识论根源来进行分析。比如，孔子的哲学，从社会根源来看，他的天命论反映了维护旧传统的保守立场；但从认识论根源来分析，他的仁智统一的学说在人类认识的大树上是有根基的，因为它包含着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的一个必要环节：理性的能动作用。但孔子把这一环节片面地夸大了，把理性原则绝对化，变成了唯心论的体系。如果我们能够对历史上各种哲学体系作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的具体分析，就能揭示出它们所包含的人类认识运动的一些环节。这样，我们就能把握作为人类认识史精华的哲学历史的逻辑发展。

用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来考察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哲学史体现了认识的矛盾运动：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就是矛盾，某个矛盾产生、发展、解决了，另一个新的矛盾又产生，经过发展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在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形上升的曲线或一串圆圈。所以，全部哲学史可以比喻为一个大的圆圈，而这个大圆圈又是由许多小圆圈构成的。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史，那么，中国哲学主要有这么三个圆圈：中国哲学发端于原始的阴阳说，先秦时期争论的“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由荀子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复到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个圆圈。秦汉以降，哲学上的论争后来归结到“理气（道

器)”之辩与“心物(知行)”之辩,由王夫之作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达到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完成了又一个圆圈。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哲学争论的主要领域是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后来都集中到“心物”之辩(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吸取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总结了近代哲学的“心物”之辩,仿佛是向荀子和王夫之复归,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圆圈。这三个圆圈又可以分成若干更小的圆圈。正是这样一串圆圈构成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阶段,每经历一个圆圈,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所以,本书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分为三篇:先秦、秦汉至鸦片战争前、近代(1840—1949年)。

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史非常丰富,包含着很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智慧。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每个哲学体系,其积极因素与局限性常常是互相联系着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哲学体系,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吸取,而要在吸取其积极成果的同时,批判它们的局限性。同时,也绝不能因为它们有局限性就一笔抹杀,而是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批判地吸取其成果与教训。

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其所以珍贵,原因之一在于它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与认识论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中国哲学着重讲做人,西方哲学着重讲求知,所以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不发达。要判断这种看法是否对,就需要正确理解“认识论”这个概念。

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

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

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法则，即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

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

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即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

如果把认识论狭义地理解为只研究近代实证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即限于上述前两个问题，便会觉得认识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如果把认识论广义地理解为上述四个问题，便可知这四个问题在中西哲学史上是反复讨论过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并非对前两个问题不关心，例如孔、墨就已讨论了感性和理论思维的关系，庄子已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客观真理”提出了责难。而欧洲近代哲学家虽然较多地考察了前两个问题，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深入地考察了后两个问题。例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的原理，就是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所作的回答，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就是要解答“人如何从自在变成自为、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而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这个问题。

我们应当广义地理解认识论，由此出发，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由于认识论与辩证法和逻辑相联系，与伦理学和美学相联系，因而是较多地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天人”之辩。“天人”、“名实”之辩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所以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二、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的特点

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不如西方哲学发达的人，都以为中国哲学“重人生而轻自然，长于伦理忽视逻辑”。这一看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中国哲学确实注重伦理，中国人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在

《墨经》中虽有很高的成就，但后来却被冷淡了，确实不如欧洲人和印度人热心。

但是，上述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是用什么逻辑和方法搞出来的。李约瑟提出了一个论点：“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37页）我们基本上同意他的这个论点。

如果说西方有悠久的研究形式逻辑的传统，那么在中国古代则是朴素的辩证逻辑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如《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提出了否定的原理；《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原理；荀子提出的“辨合”、“符验”、“解蔽”，包含了辩证逻辑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先秦所形成的辩证逻辑的雏形，不仅得到后世的哲学家张载、王夫之、黄宗羲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天文、历法、音律、农学、医学等科学中成为方法论。从先秦的《礼记·月令》和《黄帝内经》，以及后来的张衡、刘徽、贾思勰、沈括等著名科学家身上，都可以看到朴素的辩证逻辑运用于具体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自然观上，中国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而西方则比较早地发展了原子论的自然观。中国古代的辩证法的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认为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道，即自然发展的规律。中国的古代科学的天文、历法、音律、农学、医学等，就是建立在气一元论基础上的。中国人讲的“气”，类似近代物理学的“场”。西方的自然观长期与原子论相联系，类似“场”的思想虽然古代也有，但直到19世纪电磁场理论提出后，才受到充分重视。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原子论的思想，例如《墨经》说：“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认为具体的物体是由不可分割的粒子（端）构成的。不过，《墨经》的原子论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中没有得到发展。

与西方相比，原子论思想和形式逻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弱点；但是中国人却比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和气一元论的朴素辩证法自然观，从而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个认识论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这却是一个优点。

三、在考察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点

关于人的自由，首先是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哲学，强调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统一，崇尚理性的自觉。

儒家的开创者孔子提出仁知统一的学说，认为伦理学和认识论是统一的。这一学说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人的道德规范以理性原则为根据，真正的道德行为是自觉的，而这种自觉性来源于理性认识，因此人可以通过教育和修养成为有道德的人。孔子以后的儒家，虽然分成不同的流派，但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也无论是程朱、陆王还是王夫之、戴震等，都一致继承和发挥了孔子仁知统一的学说，注重伦理学上的自觉原则和“为学之方”（道德的教育和修养）。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道德行为包含着三个要素：第一，道德理想表现于人的行为，具体化为道德规范；第二，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依据于理性认识，因此是自觉的行为；第三，道德行为应该是自愿的，是出于意志自由的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自愿选择而是出于被迫，那就谈不上行善或作恶。这些要素，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荀子都已经作了考察。虽然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哲学家都指出道德行为要自觉自愿，但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两者是有区别的。两者的这一区别，正是中西哲学在伦理学说上的不同之处。

在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尽管注意到了自觉与自愿、理性与意志的统一，不过他们仍然是较多地考察了自觉原则，而较少地讨论自愿原则。他们也重视“志”，认为道德行为要由意志力